

贛縣文史資料

第二輯

編

紅軍第三十二軍司令部佈告 第一號

1407



照得國民逆黨。製造軍閥。勾結英法日美。專橫中國。工人莫有工作。兵餉被扣。商家閉門。學生沒有書。古難。禁止說話開會。奪去人民。斷。請看全國各省。遍地瘟疫。中國弄成這樣。難道任他。工農兵士暴動。一切徹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贛县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

目 录

高风亮节 永驻心田

——回忆我的父亲罗孟文……………罗亦绍（1）

大平军在赣县的战斗……………王右君（14）

赣县义和团运动……………王右君（17）

辛亥革命时期赣县的革命活动……………王右君（20）

大革命时期赣县的工人运动……………李文豪（22）

苏区时期赣县的政权建设……………廖乐暄（29）

中央苏区赣县的土地改革与查田运动……………黄谋祝（38）

1926—1934年赣县的农协组织及活动……………黄谋祝（44）

苏区时期赣县的妇女运动……………廖乐暄（49）

苏区时期赣县的青少年组织及活动概况……………黄谋祝（52）

苏区时期赣县的文化教育事业……………

廖乐暄 黄祝源 谢基晋（57）

吴月波烈士二、三事……………廖乐暄（60）

苏区时的江口港……………赵永彤（65）

国民党反动派在苏区的罪行……………文史办（68）

抗日战争时期赣县党组的建设……………文史办（74）

抗日战争时期赣县党组的统战概况……………文史办（77）

魔鬼末日犹猖狂

——日寇在赣县白鹭乡的罪行……………钟显泽（80）

四十八军解放赣县……………廖乐瞳（82）

匪首叶华山被歼记……………黄延春（84）

国民党将军吴楚山的遗孀顾祝云……………黄厚仔（86）

高风亮节 永驻心田

——回忆我的父亲罗孟文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罗亦绍
高级工程师

编者按：罗孟文是原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省顾委筹备组副组长。他1927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出色的党务工作者，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一生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整整奋斗了60年，对江西人民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我的父亲罗孟文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当他走完了八十三年的人生历程后，留下了一串闪光的足迹和许许多多宝贵的精神遗产。

一九八七年底，我得到父亲病危的消息，乘工作的间隙，立即飞往南昌探望他老人家。那时，可怕的癌细胞吞噬着他的身躯，他已骨瘦如柴，经常处于昏迷状态。当他睁开眼看见我时，脸上浮现一丝微笑，但再也不能象从前那样同我亲切地谈话。当时我任务在身，必须在一九八八年元月六日前赶回北京，与我的同事一道乘专列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因此，元月三日我不得不带着极其沉痛的心情离开弥留之际的父亲。我元月五号早晨到京，六号便出发了。我的爱人七号

接到父亲病逝的消息，那时我已在西去的列车上，无法立即通知我。到达卫星发射基地的那一天（即元月十二日），电话传来了父亲与世长辞的噩耗，我悲痛欲绝。当时正值对发射第三颗通讯卫星技术性能进行全面测试的紧张时刻，我又担任星上测控系统指挥岗，而爱人已定于十八日赴日本考察，故元月十六日的遗体告别仪式我们均未能参加。这是我们的终身遗憾。为了事业，父亲是会原谅我们的。

回想往事，历历在目，父亲高大的形象将永远激励我奋进！

一 崇高理想 奋斗终身

我的父亲罗孟文，字质彬，1905年1月22日（清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于江西赣县南塘乡清溪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我的祖父罗孔荣，是个纯朴正直的贫苦农民，粗知文墨，略懂医道，武艺精良；我的祖母谢氏，勤劳贤慧，心地善良，生有姑姑和父亲姐弟二人。父亲4岁时，祖父去世。祖母为生活所迫，将姑姑送去做童养媳，把父亲送到我舅爷家去抚养。父亲从7岁开始，就帮我舅爷家放牛、放江鸭。父亲10岁时，祖母将他接回，在清溪村里读书。两年后，祖母病故，父亲成了“可怜的孤儿”。我的叔爷罗孔佐带他到自己家里生活。从此，父亲随我叔爷下田干活，学会了一切犁耙、育秧、插秧、打稻等技术，成为一名种田的好帮手。

在中国大地一片黑暗，只有井冈山星星之火放出光芒的年代里，父亲与许多革命先驱者一样，不怕流血牺牲，投身于革命。1926年秋，北伐军打到了赣州，父亲怀着对地主豪绅的深仇大恨，加入了农民协会。据我八十高龄的堂兄罗

亦经同志（1929年入党，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回忆：“孟文叔自幼丧父母后，就住到我家，我俩一块种地。孟文叔革命积极，他感到不革命没出路。他没有田地，没有财产，也没有兄弟姐妹（姐姐当童养媳去了）。一九二七年阴历三、四月份，他参加了赣县清溪的农民暴动，打警察局。暴动以后，上级分配他做侦察员和通讯员工作”。1929年12月，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不久，陈毅、罗炳辉率领红军来到赣县田村、清溪一带，摧毁了反动政权。1930年，清溪乡苏维埃政府成立，他是我们乡第一任乡苏维埃主席。他领导贫苦农民搞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动员参加红军，保卫胜利果实，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

1932年1月，中共赣县县委调我父亲任中共茅店区委书记，并兼管储潭工委工作。在这红白交界区，他积极发动群众与地主的反攻倒算作斗争，鼓励大家参加红军，保卫苏维埃政权。同年春天，他不分昼夜地筹集粮草和油盐菜，保障攻打赣州城的红军部队的供给，得到了红军攻城指挥部的表扬。随后，父亲调到赣县县委任宣传部部长兼白区工作部部长。

1933年7月，父亲出席了在宁都召开的中共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省委候补委员。省委书记李富春同志把我父亲调到省委白区工作部任副部长。不久，蔡畅同志卸去部长职务，由父亲接替。父亲在白区秘密发展党员，建立支部；侦察敌情；发动工人罢工；购买苏区紧缺物资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

1934年1月，父亲出席了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同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设立赣南省。父亲担任中共赣南省委组织部部长，并代理过半个多月的省委书记。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开始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在都出发前夕，亲临赣南省作了重要指示。毛泽东主席找我父亲谈话，嘱咐他要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坚持赣南游击战争。当时，阮啸仙任赣南省委书记，杨尚奎同志任宣传部部长，蔡会文任赣南军区司令。担任赣南省委组织部部长的父亲和一部分同志，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对敌斗争。

1934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找我父亲谈话。传达了中央局的决定，派父亲回北靠泰和，南临赣州的杨赣苏区，担任特委书记兼第四军分区政委。在领导和指挥杨赣特区的游击战争中，为配合整个赣南游击战争和主力红军北上的伟大行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35年3月，在崇贤与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曾山同志率领的省委机关和红二、四团会师。曾山同志指派我父亲兼任杨赣特区的革命武装红色独立十三团政委，并将杨赣特委和红十三团划入江西省委领导。省委扩大会议决定分别突围去赣粤边，与李乐天、杨尚奎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会合，并通过他们取得中央分局项英、陈毅的领导和指示。突围开始不久，父亲在冲锋战斗时腿部受伤，仍忍着剧痛继续率领部队冲锋杀敌。但因伤势过重，行走极其艰难，而父亲又执意不肯离队治伤，最后只好以个人服从组织决定。由特委委员赖福林代理书记和红十三团政委带领部队继续突围。在向西洋

山前进途中，中了国民党军的重兵埋伏，红军部队被打散，少数同志冲出重围，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特委领导人赖福林、王启生、罗孟潮等16人被俘，先后遭杀害。1935年5月，父亲得到部队被打散的消息，悲愤极了，再也无法安心养伤。拄着木棍，和警卫员离开谢山，潜往白区赣州东郊一带，寻找失散的同志，把队伍慢慢再壮大起来，准备上油山，迎接新的斗争。但国民党反动派势力扬言：抓住“匪首罗孟文”者，“悬赏银元两千元”，并四处张贴布告。父亲扮做老板，他的一些战友扮成伙计，在泰和、万安、遂川、赣县、赣州郊区等一带活动。积极领导地下党组织，利用各种形式发动群众，与敌人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从而打击与孤立反动势力，团结与教育了群众，壮大了革命力量。1937年1月底，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和我父亲等人在马家洲召开了失散的江西和赣南两个省的主要干部会议，成立了中共江西临时省委，有党员120余人。会上，推选了临时省委委员7人，刘启耀为书记，父亲为组织部部长。会上确定了临时省委的工作方针和任务。父亲组织上山烧炭的同志陆续下山，分别安插在遂川、万安、泰和等地从事各种职业，开展群众工作。

1937年9月，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二次国共两党合作已经形成。父亲同刘启耀等到油山，找到了中共赣粤边特委，会见了老战友、特委书记杨尚奎。根据陈毅同志指示，撤消中共临时江西省委的名义。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开展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收集打散的游击队员的工作，特委派父亲回赣县任工委书记。

父亲明知有危险，如走虎穴，却毫不犹豫地接受组织分配的工作。父亲想，怕危险，耽心被敌人杀头，就不去开展工作，还算什么共产党员。为革命而挺身走险，早已习以为常了。一天，父亲一行四人赶到老家清溪发动群众，收集打散的游击队员。回到清溪不久，被反动的联保主任扣押。激起了广大革命群众极大的愤慨，并把联保主任家包围得水泄不通，还正告反动势力：“谁要是伤害了罗孟文一根毫毛，就要他们全家性命抵偿！”革命群众自己组织起来，我叔爷罗孔佐等派人火速赶往赣州找到中共赣粤边特委驻赣州的党代表，和伪赣州专署交涉后，迫使反动的联保主任放人。接着组织上分配父亲到中共信丰县委任组织部部长。1938年1月，调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任机关党支部书记。1938年7月，又调任遂万泰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书记。1939年1月任遂万泰中心县委书记。1939年5月，中共赣西南特委成立，刘符节任书记，父亲先后任委员和民运部部长。

1939年12月，党中央拟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父亲奉上级指示，离开泰和，经赣州、韶关、桂林（中共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同志接待，在此和杨尚奎同志会合）于1940年1月到达延安。1940年至1945年，父亲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任党总支委员。他感到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抓紧时间攻读文化课和理论书籍，以至最后疲累病倒。在整风运动中，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方针，总结了自己参加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赣西南党的部分情形》《赣西南党史大事日记》、《关于赣西南的红帮》等几篇颇有价值的长篇报告。并严格解剖自己，写下数万言的《历史思想自传》，向党交心，接受组织审查。1945年4

月，父亲作为党的“七大”候补代表，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5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南下广赣干部大队，父亲被调任支部书记，随三五九旅南下，赴南方建设根据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原定南下的父亲和杨尚奎、危秀英等随军行至太行，接到中共中央的电令后，立即停止南下，掉头北上，日夜兼程，奔赴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于1945年11月初，到达中共中央东北局所在地。东北局组织部部长林枫分配父亲到中共四平省工委任组织部部长。父亲说：

“我刚到新区，工作应从下面做起。”林枫同志同意父亲的要求，叫他到中共吉林省委报到。吉林省委分配他到中共永吉地委工作，任地委委员。永吉地委书记袁任远同志派我父亲到战略要地蛟河县任县委书记，并兼任县保安团政委。蛟河县民主政府成立后，在父亲等领导下，进行了平叛剿匪斗争，粉碎了一起又一起的反革命叛乱。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指示，父亲把发动农民，实行土地改革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土地改革促进了农村生产，激发了农民参军支援前线的积极性，受到了军区司令员周保中的赞扬。父亲在蛟河工作期间，非常重视党的建设和干部的培养。他举办了多期军政干部和政治干部训练班，给学员讲课、做报告，并参加学员讨论。他还强调用“带徒弟”的方法“带”干部，言传身教，使蛟河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干部，既满足本县需要，还有力支援了部队和外地。

1947年6月，父亲调任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为吉林省的组织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1949年4月，父亲任吉

林省南下干部大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协助大队长兼政委的杨尚奎同志率领千名干部进关南下，当年7月抵达江西省南昌市。

1949年3月14日，父亲率领数百名南下干部随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八军进了赣州城。中共江西省委任命他为中共赣州地委副书记，赣州专员公署专员。3月15日，中共赣州地委、赣州专署（7月上旬在南昌组建）机关也进驻赣州，并宣告赣州军管会成立，四十八军军长贺晋年任主任，四十八军政委陈仁麒，地委书记黄凯、父亲为副主任。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顺利地完成了接管任务，赣南各县、区、乡的人民政权都建立起来了。父亲根据中共江西省委指示，动员全区党政军民，筹集粮食物资。赣州军民仅用25天时间，就修起了一座长达千米，能同时走两部汽车的“赣州前进大桥”的西河大桥，有力地支援了叶剑英、陈庚和邓华准备率部取道赣南，进攻广州，继续南下，解放全中国。父亲冒雨为大桥通车剪彩，至今还常在脑海浮现。

1949年11月，中共赣西南区委成立，父亲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他知人善任，对各县区的领导班子做了妥善安排。既充分发挥南下干部的骨干作用，又尽力发扬苏区老干部联系群众的长处。父亲还主办了赣西南区党委党校和赣州革命烈属子弟学校，培养了大量本地干部。

1951年7月，父亲调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1952年11月，任组织部部长；1953年1月，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分管党群工作；1955年8月，中共江西省监察委员会成立，他出任第一书记，直到1967年。在这期间，还被选为一至四届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二、三届省政协副

主席。在省委工作期间，在组织、干部、党务、纪检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对江西省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史无前例”的年代，父亲象许多革命老干部一样，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游街示众，轮番批斗，关牛棚以至关进监狱与世隔绝达四、五年之久。不管大帽子如何压人，也不管监狱里如何饥饿，几天才放一次风，还要忍受班房茅厕混杂的污浊空气，甚至寒光闪闪、手枪逼着在微弱的灯光下写交待材料。在那漫长的岁月里，父亲忍受了肉体上的极大摧残和精神折磨。始终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保持对党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强革命意志和高风亮节的崇高精神。他坚信马列，相信党，相信真理，充满着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铮铮铁骨。

1975年父亲恢复工作后，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毅然接受组织交给他的统战工作，任省革命委员会统战部办公室主任，省委统战部部长，省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届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不顾心脏病的威胁，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尽心竭力，在完成拨乱反正、为加强全省各党派之间的民主协商，为落实成千上万的爱国民士的政策、平反数以万计的文革中和历史上的冤假错案方面，在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方面克尽职守，做了大量工作。一九八三年，父亲退居二线，此间多次给我写信谈到“这是按照党的十二大精神执行的，我是七十七岁的老人，让中青年四化干部上来，这是解决干部老化的大问题。”尽管工作少，但他仍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事业心，

积极参加整党学习和省顾委工作，充分发挥自己的光和热。一九八五年四月，中央批准父亲离职休养。他坚持每天读书看报、听广播，关心天下大事，干力所能及的劳动，他是一位永远闲不住的人。

二、勤劳俭朴 平易近人

父亲始终保持勤劳俭朴、平易近人的劳动人民本色。他不抽烟、不喝酒，极少喝茶。穿着也不讲究，经常布衣布裤。吃饭时，掉在桌上的饭粒一定捡起来吃下，这老习惯一直保持着。一九八三年他住北京阜外医院看心脏病时，我看到他仍是如此。并时常在饭桌上教育子孙爱惜饭菜，不要浪费。记得有一次，我将有毛的肉皮吐在桌上，爸爸说：“怕什么，吃下去还不是屙出来嘛！”

父亲来北京开会时，我的岳母留他吃饭，他说什么也不肯。他对我说：“会议已预备了饭，不吃要浪费。北京冬菜这么贵，青椒、韭菜的价跟猪肉差不多。在人家吃饭，一要添麻烦，二要增加人家的负担。”

每天早起，总是自己叠被整床，打扫房间，然后扫院子。外出开会，自己洗衣服。来京开会期间，我们一家去看他。我爱人要给他洗换下的衣服，他执意不肯。实在拗不过我们，才勉强同意。即使爸爸病重住院，医生只同意他每星期日回家团圆一次，他也是楼上楼下四处看看，拾掇东西。一九八六年冬天的一个星期日，防蚊蝇的纱门还未卸下，他回家看到就嘱咐我的弟媳，抽时间把纱门卸下，打扫干净收藏起来，好多用几年。

一九七四年初，组织上决定一家从省民政局招待所搬到

环湖路一单位宿舍住。一天，爸爸亲自挑蜂窝煤上四楼。我侄儿看见了，实在不忍心年近古稀的老人这样干。气得有点发火，对他说：“这几个钱还舍不得？！”老人慢条斯理地答道：“我不是想省这几个钱，锻炼锻炼，活动活动嘛！”

外出开会、检查工作，对住吃从不挑剔。下乡视察工作，他常和社员一道插秧、耕田……边劳动，边和他们聊天，了解农村情况。为了工作，他从不辞劳苦。

六十年代初，有一次我从北京回南昌度寒假，陪爸爸到民德路剧场观看春节慰问演出，来回我们都是步行。平时，他看戏、游泳、上街常如此。八十年代初，父亲已七十多岁了。在京参加全国政协和统战工作会议期间，有好几次他由秘书陪同，由友谊宾馆或西苑饭店乘一小时的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到王府井附近去看望我的岳父岳母。我惊讶地问他：“你怎么不要车？”爸爸说：“星期天，不少民主人士也要用车看看亲朋好友。我用，他们就不好用了。”当返回宾馆时，我去叫出租车，爸爸坚决制止，硬是和工作人员一起挤公共汽车回去了。

爸爸是官也是民。他对人和藹可亲，谦虚热情。他不训人，说话总是那样低声细语。他不论对首长还是部下，不论对我的同学还是家乡来的“老倌”，或是告状、申诉的，都一样热情。亲自给他们端茶倒水，摆上糖果小吃，同他们边叙家常，边谈工作。记得有一次，随爸爸由东北南下到赣州的朝鲜族警卫员卓庆山叔叔生病，高烧不退，爸爸亲自冲鸡蛋糖喂他，用湿毛巾给他降温，长时间守护在他身边。当美帝侵朝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时，卓庆山叔叔毅然加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斗行列。朝鲜停战后的一天，我看见父亲

呆呆地坐在办公桌前。见我来了，嘴唇微微擅动，哽咽半天才吐出一句话：“你卓叔叔在朝鲜光荣牺牲了。”父亲的泪水夺眶而出，不断地落在玻璃板上。

我的父亲为人诚恳厚道。他对本单位干部的工作、调动、生活困难补助、婚姻、丧事等都非常关心。凡应给予解决的他都尽量解决。而且定下来要办的，一定办到，善始善终。老干部彭儒妈妈常对我说：“你爸爸真是个老实人，对人真好！”一位曾与爸爸共事过的阿姨给我写信，“对你父亲，我的老首长，毕生将铭记他老人家对我的教育和关怀。”

三、谆谆教导 心中楷模

一九五六年我初中毕业，为了能尽早独立生活，我想报考中等专业学校。那时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党和政府号召向科学进军。因此，我的班主任老师希望我考高中。父亲得知后，也积极支持。

后来我到北京上大学了，爸爸勉励我政治上要积极上进，学习上要刻苦努力，生活上要艰苦朴素，不能特殊。每月我和许多同学一样，收到家里寄来的二十元，作为伙食费、书本讲义费和零用钱。他还常常写信教导我：“你是我们村里第一位大学生，要好好学习。学好本领为国家更好地工作。”我知道，这不仅是他老人家的心声，也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下一代的殷切希望。每当我学习上遇到困难时，这亲切的话语就在耳边回响，给了我信心、勇气和力量。

在我走上工作岗位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我给家里寄去二十元。父亲来信说：“以后不要寄钱给我，自己攒着，将

来成家用得上。我们老了，党和国家会管我们的。”他还时常嘱咐我，要好好工作，并且“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注意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党为人民多贡献一点力量。”

父亲很喜欢他的孙儿孙女，但他更注重对他们的教育。他在晚年还经常亲自给孙儿、孙女写信，“从你们（指我的孩子小昆、小鹏）的来信看来，还好。尤其是能检查总结自己的优缺点，这是你们进步的表现。希望继续保持这种精神。爷爷年老，又有心脏病，加上从小仅读了三年小学，后来没钱上学了。参加革命学了些文化。你们年幼就要好好上学，多学本领，将来为国家做贡献。”他还嘱咐他们一个季度要写写自己的学习和进步情况。

一桩桩往事魂绕梦牵，父亲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为我失去慈父而悲伤，也为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爸爸生前留给我唯一的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克己奉公，高风亮节。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是，人民会永远记住他，我们会永远怀念他，学习他，踏着他的足迹前进！为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而贡献我们毕生力量！

安息吧！敬爱的父亲！

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太平军在赣县的战斗

1851年1月（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义。次年（咸丰元年）经全州，入湖南。1853年1月，攻克武昌。3月（咸丰三年二月），攻克南京，定都。5月太平军开始北伐和西征。石达开率部转战江西，此时赣南各地的农民义军纷纷响应，配合太平军战斗，重创清军。

自咸丰三年七月至同治四年四月，太平军和赣南各县地方农民义军，战斗于赣南广大城乡，和清官军、地主豪绅武装展开了殊死的战斗，攻克了赣州府属各县县城，使清朝政府和地主豪绅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赣县县城（今赣州市市区）是江西南部重镇，赣州府驻地，赣南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为太平军必攻之地。在太平军大部队围攻县城前，小股部队曾在县境北部边沿进行过游击活动。咸丰二年（1852年）七月，赣县官绅就开始设立义勇局，组织和操练乡勇，筹备器械，强化保甲，准备和清官军一起，抵抗太平军的进攻。

咸丰六年（1856年）正月，太平军经过艰苦的战斗，终于攻克吉安。赴援吉安清军的驻赣县分巡吉南赣宁兵备道周玉衡被击毙。二月，护理赣南宁巡道汪报润（原南安府知府）增募兵勇，驰赴万安增援清军，又被南进的太平军击败，退守赣县城。太平军乘胜进入县境。部队分驻县沙石埠、楼梯